

古巴共黨暴政十一年

王建勛

古巴赤化以來，卡斯楚政權長久均處於內部鬥爭及經濟困難當中。一九六八年以後，共黨內部鬥爭激烈，「革命輸出」以及「蔗糖增產」的失敗，已使卡斯楚面臨新的危機，尤其是在經濟困難壓力下，其對古巴人民的加緊壓制，普遍激起了反抗，顯示古巴經過卡斯楚十一年的暴力統治，已漸趨走向滅亡。

壹 古巴共黨的內部鬥爭

在古巴赤化以前，古巴共黨是以「人民社會黨」(P.S.P.)的名稱掩護下從事活動。它主張實行史達林式的「聯合法西斯」政策，此一政策乃是基於「民族資產階級進步份子」的保護與合作」，所以當時古巴共黨乃認為主張山地叛亂的「死硬派」份子毫無希望的冒險，並指責他們應對一九五八年四月哈瓦那大罷工失敗負直接責任。(註一)直到卡斯楚(Fidel Castro)領導瑪宜斯塔山區(Sierra Maestra)中的叛亂份子向哈瓦那(Havana)進軍的時刻，古巴共黨的頭目埃斯卡耶第(Ambal Escalante)才與卡斯楚接合。卡斯楚武裝叛亂奪取政權以後，從一九六〇到一九六一年，為表現出古巴共黨確已控制了「古巴革命」的基礎，曾暫時迎合古巴共黨的經驗。在這段期間，埃斯卡耶第進入到古巴「共黨執行委員會」，並負責創立「拉丁美洲革命組織」，而成為一個共黨理論權威。一九六二年火箭危機以後，古巴與蘇俄關係開始惡化，卡斯楚就認為埃斯卡耶第是親蘇派的頭目，於是卡斯楚就開始排斥一些老古共份子。一九六六年三月，埃斯卡耶第被革去黨內職務，使古巴共黨遭到最嚴重的打擊。同年八月，卡斯楚又進行清黨，他

策動「古巴工人聯盟」第十二次大會重新選舉，而把工人領袖的位子讓給前山區游擊隊重要份子馬丹(Miguel Matin)，並且只有蔗工頭目貝克(Lomrado Becker)逃掉被清的命運，其他老共黨均被清除。所以前古巴共黨(P.S.P.)份子就認為卡斯楚只不過是一個「偶然機會主義」者而已，更為對立。埃斯卡耶第在亞列爾(Yarer)村莊隱居，但暗中仍與其黨羽密取聯繫，繼續他們傳統的政策，並吸收青年共黨份子走蘇俄的「修正主義」路線(註二)。到一九六七年間，由於蘇、古關係繼續惡化，共黨內部鬥爭更為尖銳。卡斯楚利用最早與其接合的共黨(P.S.P.)重要份子拉法埃爾(Carlos Rafael Rodriguez)來抨擊埃斯卡耶第集團，是「反常的」、「卑賤的」，亦是「死無餘地」的。然後卡斯楚就以「反革命」、「反黨」等罪名指控數十位親蘇的共黨份子，並交付「軍事革命法院」審判。但最後亦只是幾個重要份子如古巴共黨委員、水果產銷負責人卡西邁斯(Ramon Cal-cines Gordillo)、及前「國防委員會」主席、後出任匈牙利大使的瑪塔(Jose Matar Franje)被解除了職務，而對埃斯卡耶第的反對勢力並無多大影響。所以被卡斯楚指控為「一小撮」「小資產階級」腐化思想的「傳統派」，就對卡斯楚展開了猛烈的攻擊。他們指責卡斯楚之弟、「國家安全委員會」及「武裝革命委員會」主席包爾·卡斯楚(Raul Castro)加緊對人民實施軍事訓練，特別是組織民兵的錯誤。並且對卡斯楚發動「蔗糖增產」運動，亦有着悲觀論調，指出在國內不斷增加中的經濟困難，諸如糧食生產不足，工業生產落後，均無法使蔗糖生產在一九七〇年達成一千萬噸的目標。此外更攻擊蓋瓦拉(Ernesto Guevara)為配合卡斯楚的「革命輸出」，而在拉丁美洲從事瘋狂的武裝顛覆。

這些雖然是很少數親蘇派共黨份子的指控，但在宣傳上却發生了重大作用。而卡斯楚亦就因為這些老古共份子的反對，其真正意義是很難估計，而最感恐懼。就如當時古巴工業部門的報告，在「國防部」、漁港、「烟草製造廠」、「農、工研習所」、「國家科學院」、共黨機關報「葛郎瑪」(Granma)、「無線電傳播學院」等機構的重要負責人，很多都同情親蘇共黨份子的立場，起碼已表現出古巴人民隨着古巴共黨的內部鬥爭，已逐漸形成一股不可忽視的反卡斯楚力量。卡斯楚為要鞏固他的地位，就不可避免的再對這「一小撮」親蘇共黨份子進行徹底「整肅」。

古巴共黨自創立以來，只在一九六五年十月召開過一次共黨大會，及至古巴共黨內部鬥爭激烈，卡斯楚才在一九六八年一月廿四日召集共黨大會。事實上，卡斯楚召集此一非常會議的目的，旨在結束古巴共黨內部「一小撮」親蘇共黨份子的活動。會議由中午至午夜，卡斯楚一直指控着埃斯卡郎第及其黨羽曾勾結蘇俄、捷克及東德人員陰謀反對古巴政權。會後數天，一月廿八日，古巴共黨機關報「葛郎瑪」就刊載了包爾·卡斯楚的一個長篇報告，揭露了「一小撮」親蘇共黨份子「反黨」的罪狀。又未數日，古巴軍事革命法院就宣判了卅七個前古巴共黨(P.S.P.)重要份子的罪刑，其中埃斯卡郎第被判十五年，餘者十年、八年、四年及二年不等。(註三)

貳 「蔗糖增產」與經濟危機

卡斯楚對親蘇共黨份子的「整肅」，並未解除其所面臨的各種困難，尤其是經濟問題的壓迫，更使卡斯楚喘不過氣來。古巴經濟困難的原因，其一是古巴經濟由於原料生產的限制，不能獨立發展，必要仰賴對外貿易，雖然有蘇俄給予經濟援助，但却不能完全抵償美國對古巴實施經濟封鎖所造成的災害，何況蘇、古關係的不斷惡化，蘇俄經常減少或以停止援助來要挾。其二是卡斯楚增產的失敗。就握有古巴經濟命脈的蔗糖而言，古巴蔗糖產量，在一九五九年以前，曾高達七百九十萬噸，佔世界第二位，其輸出額達85%，為世界第一。但在古巴赤化以後，產量不斷遞減，一九六一年為六百萬噸，一九六三年最低三百八十萬噸，一九六五至一九六八年，均未超出五百萬噸(註四)。在輸出方面亦是一樣，自一九六二年美國放棄購買古巴的糖

，糖的輸出就完全依靠蘇俄，要不是蘇俄以高於國際糖價收購，古巴經濟早已崩潰。

從一九六六年起，卡斯楚就企圖以增加蔗糖產量，來解除經濟的困難。他在共黨國家能收購更多蔗糖的假想下，要在一九七〇年優先達成一千萬噸的目標。因而在在一九六七年他就發動了「蔗糖增產運動」，數以百萬計的農民、工人、學生及公務員，每年必須要有四個月的時間在蔗田工作。這段期間，在哈瓦那稱為「甘蔗收穫季」。但是這些毫無收割經驗的人參加蔗糖增產工作，顯然引起更多混亂；不是砍錯了部位，就是磨洋工，反而更搞糟了來年的收成。由於一九六七年的蔗糖產量並未提高，所以從一九六八年以來，卡斯楚就使用着軍隊加緊對人民壓迫，脅迫着軍隊對那些怠工或干擾甘蔗收割的人射殺，所以經常有古巴人，不經審判程序，在蔗田或工人面前被槍決。但是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古巴與東歐共黨國家所簽定二百一十萬噸蔗糖，迄今仍未交貨，並且在一九七〇年底必須要交給蘇俄八百萬噸糖，亦無任何可能的跡象。此一情勢的壓迫，而使得一九七〇年成為決定卡斯楚「革命榮譽」生死的一年。

事實上，卡斯楚要在一九七〇年達成一千萬噸糖產的目標是很難實現的。就根據最近訪問古巴歸來的一個法國農業經濟專家居蒙(René Dumont)的估計，古巴在一九六九年的蔗糖生產，不可能超出四百卅萬噸。並且他指出，卡斯楚為了補救已對共黨國家承諾的嚴重赤字，已將未成熟的甘蔗砍掉，以作為再種植的根。另一方面，卡斯楚為增加甘蔗的收割，亦改變了古巴傳統由元月至五月的甘蔗收割季，而由一九六九年七月延長到一九七〇年七月。被迫參加收割甘蔗的人亦不斷增加。但是居蒙仍認為未來的收成與其預定目標遠甚。就如他舉出的一些事實說明：卡斯楚把參加「蔗糖增產運動」的所謂「志願工作隊」及「勞動生產隊」編配成「收割」、「運輸」以及「分割」等各種小組，但是這些小組經常不能彼此配合，這種情形在卡馬開(Camagüey)省最為嚴重，那些已被收割的甘蔗要等兩三星期以後才能分割，按照規定這兩種行動是不能超過一天的。並且曾超出12%的煉糖率，迄今平均只是10.85%，而有些糖廠更降低到4%。這些都是蔗糖增產必將失敗的原因。誠然的，設若甘蔗增產計劃失敗，卡斯楚就要面臨更多的困難。但是亦有一些國際專家們認為，即使卡斯楚在蔗糖增產方面失敗，仍不

能否認古巴的農業已有了相當的進步，因為古巴在農業方面的投資，已超過所有拉丁美洲國家，佔國民生產總值的25%。最近聯合國糧農組織(F.A.O.)的報告，亦表示古巴的土地利用、土地開發、灌溉以及工路建築等，在所有拉丁美洲國家中，是進步最快的國家。然而我們從卡斯楚的希望、計劃與實行間的經常混亂，以及農民對於農業組織軍事化的反感，在在亦都表現了一個否定的因素，對於卡斯楚要使農業生產每年增加15%的說法，亦不能不表示懷疑。

古巴赤化以後最初幾年，古巴的鄉村確是有些改變，特別在首都哈瓦那附近的農村，在那裏原有的荒蕪地和私人未加利用的土地，迄今都已種了咖啡或開闢為牧場，但是主要的糧食生產卻沒有增加，而必須仰賴共匪的糧食進口。一九六六年，雖然人口膨脹糧食需要增加，但仍趕不上共黨執政前的水準，加以古、匪關係惡化，糧食更感缺乏。一九六七年卡斯楚為增加甘蔗生產，把部份蔗田改為稻田，糧食供應更為困難。一九六八年初，卡斯楚將糧食缺乏的責任歸咎於農民的任意耕種，而影響了必要農產品如食米等的生產。卡斯楚為限制人民的耕種，就開始實行「人民公社」(Granja del Pueblo)的制度。在這一制度下，農民雖仍保有三分之一的土地，但所有的土地，均依其特性嚴格劃分為各種單一的種植區，「人民公社」就隨着種植區的劃分，一個個的建立起來。由於「人民公社」是要改進以前不規則的種植，「限定種植」就成為唯一目標，而逐漸走向極端。就如在此「人民公社」推行下，特別要在東方(Oriente)省從事六萬五千頃面積的稻米種植，並要在卡馬開(Camaguey)省開闢能飼養一百四十萬頭牛的大草原。然而工作組織及技術條件的惡劣，肥料與拖拉機的缺乏，已普遍發生困難，尤其是無法克服的森林與崎曲的山地，難以改變的原種植甘蔗、蔬菜、咖啡的沿海半沼澤地，亦使此一計劃宣告失敗。

誠然的，古巴農業發展，十年來，仍只是在緩慢的爬行階段。而生產的不足，供應的困難，卡斯楚就不得不把國民經濟壓制到實際上只是苟存的程度。一九六七年又逢旱災，農業生產大受影響，因此，從一九六八年以來，卡斯楚再壓制人民，使國內消費減少到最低限度，而且必須要實行嚴格的分配，就像工業及對外貿易一樣，全部農業生產由政府嚴格控制，一切均實行配給，於是糧食更感缺少，黑市供應亦告乾涸。另一方面，卡斯楚為要

使農業生產增加，更將全國農業組織均控制在軍事與黨的組織系統之下，加緊壓迫與奴役人民增加生產。所以目前古巴特別是搞生產，已成為人民奉獻無休止的努力，人民長期被迫奴役中，又不能獲得溫飽情形下，於是民怨沸騰。

叁 暴力的統治與人民的反抗

卡斯楚在經濟困難情形下，必須要實行極端嚴厲的經濟管制與配給措施，這是古巴人民所不能忍受的，亦是古巴共黨內部鬥爭，雖在卡斯楚不斷「整肅」下而不能停止的。因為親蘇的老古共份子仍經常贊成蘇聯的「牟利」政策，而古巴的工商業更存有資本主義復辟的意識，但最嚴重的是古巴人民在嚴格配給制度下的困苦生活，已在接受物質刺激而引起不斷反抗。所以卡斯楚對埃斯卡爾第「整肅」以後，接着就聲言國內私人的商業中，亦有95%是「反革命」的。於是在一九六八年三月就發動了古巴赤化九年以來的第二次「革命」。卡斯楚仿效共匪「文化大革命」，成立所謂「革命保衛委員會」，以推動「商業國有化」運動。他們以反對「特權」、「剝削」和「寄生蟲」的口號，將私人的商店均沒收為國營。據古巴商業部在一九六八年六月的報告，全國已有五萬五千六百三十六家商店實行了國有化，其中包括有酒店、珠寶店、咖啡館、肉店、家禽店、服裝店、皮鞋店、理髮店、照像館、洗染店等。最後連街頭上的水果商與小吃店亦未能逃脫國有化的命運。

但是經過一年來的事實證明，「商業國有化」的措施，對於古巴的經濟毫無補益；不但未能解除其所面臨的經濟危機，相反的，生產與供應的困難更為惡化。商店空無一物，因無物可買，錢幣在古巴已無用處。所有消費如購買糧食、衣服、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在配給制度下，都要大排長龍，有時排隊達數小時之久，尚不能購得一物或獲得一飽。

因此，從一九六八年以來，搶劫、放火、破壞工廠以及學生示威就層出不窮，更有憤怒的古巴人民焚燬古巴的國旗。然而卡斯楚又認為人民的抗議是出於「資本主義」的「反革命」份子的破壞行動，而加強鎮壓；一方面制定嚴格的法律，規定十四歲到十七歲的青年，必須放棄學業，接受軍事訓練，另一方面對於那些不易制服的大學生，則以再改造的方法，迫使其勞動。

但是由於一九六八年八月捷克自由化運動的影響，更有惡化的趨勢，那些對現狀不滿的學生，雖卡斯楚指控他們是古巴「第五縱隊」，但仍未停止他們的示威活動。

捷克自由化運動，鼓勵了古巴文化界響起支援自由化運動的叫囂。使古巴青年普遍受到影響。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日，古巴「文藝協會」審查委員會的評審委員們，一致通過了卅六歲詩人巴迪拉（Heberto Padilla）一本詩集及卅三歲劇作家阿拉法（Anton Arrufat）的一個劇本獲得文學獎。前者的作品是歌頌自由，後者的劇本是描述一個兩兄弟由鬥爭而死的希臘悲劇，用以影射古巴共黨的內部鬥爭。因而激起卡斯楚的憤怒，而要結束他與知識份子的「蜜月」關係，開始對知識份子鎮壓。他在西恩佛埃哥斯（Cienfuegos）召開的文藝寫作大會上，以恐嚇的口吻指責知識份子的「反革命」行動，然後就指控巴迪拉與阿拉法與美帝勾結，陰謀反對古巴共黨，而成為代罪的羔羊。

無論如何，古巴人民在卡斯楚暴力統治下，已開始反抗。不單是國內反卡斯楚的「革命」行動逐日增加，自一九六八年以來，古巴人民向外逃亡，迄今已達六十餘萬（註五）。而他們在邁阿密（Miami）、巴哈馬（Bahamas）以及關塔那摩（Guantanamo）都在從事武裝推翻卡斯楚的準備，他們在一九六九年五月三日及一九七〇年一月十八日曾兩次在古巴南部東方省（Oriente）登陸，雖均告失敗，但他們仍聲言必要在一九七〇年推翻卡斯楚政權。（註六）

肆 卡斯楚「革命輸出」的失敗

古巴面臨的政治與經濟危機，已使卡斯楚政權更為黯淡。從一九六八年以來，每年一月的「革命週年紀念」，卡斯楚已不像往常那樣瘋狂的叫囂着要使整個拉丁美洲獲得「解放」。並且因為蘇俄對運往古巴的汽油以及軍事物資的限制，所有軍事車輛均未參加檢閱儀式，其閱兵亦由學生與工人所代替。雖然在哈瓦那「革命廣場」上仍張掛着「爭取最後勝利」（Hasta La Victoria Siempre!）的標語，以及卡斯楚「革命伙伴」已死的蓋瓦拉的巨像，但卻無法掩蓋卡斯楚支援拉丁美洲共黨武裝顛覆已告失敗的徵象。

自從古巴赤化以後，卡斯楚就不斷以金錢、武器支援委內瑞拉、哥倫比亞、玻利維亞、以及瓜地馬拉等國的共黨從事武裝叛亂，並且各國的共黨武裝叛亂份子，很多都接受過古巴的游擊戰訓練。這是國際間一再證實，亦是卡斯楚所曾經承認過的事。

在一九六六年間，卡斯楚更以玻利維亞地勢險要，不但東南那卡瓦素（Nancabaza）山谷地區與阿根廷、巴拉圭及巴西的邊境相接連，並且亦是南美洲之心臟，故而在整個顛覆策略上，必要利用玻國的游擊戰，來向整個南美洲國家伸延。於是一九六六年秋天，蓋瓦拉就承擔了卡斯楚基於國際計劃而擬具的具體行動路線，潛入玻國，推動此一對南美洲全面顛覆的計劃。卡斯楚在這一計劃下，曾先後派遣了十幾個曾與他在瑪伊斯塔（Sierra Maestra）山區從事武裝叛亂的伙伴以及高級軍事人員，前往玻國支援。諸如古巴共黨中央委員維達羅（Juan Vitelio Acuna Nunez）、桑契斯（Antonio Sanchez Diaz）、歐維斯（Eliseo Reyes Rodriguez）、瑪西恩（Ricardo Machin Hoed de Beche）及曾任古巴邊區防衛司令的潘都哈（Orlando Pantoja）等，他們都是先後以巴拿馬或烏拉圭護照，以化名潛入玻利維亞，但是在在一九六七年間，不但蓋瓦拉被玻國陸軍擊斃，該等亦在Vado del Yeso、Iguira、Vallegrande幾次戰役中被殺。而徹底粉碎了卡斯楚的此一顛覆陰謀。（註七）

卡斯楚支援玻國共黨武裝顛覆失敗以後，哥倫比亞、委內瑞拉、瓜地馬拉亦都破獲了共黨武裝叛亂組織。於一九六七年八月在哈瓦那召開的「拉丁美洲團結組織會議」所引起的爭論，很多國家共黨頭目亦都不再贊成「游擊戰」，而譴責「武裝鬥爭」是「冒險主義」。巴西第六屆共黨大會對「武裝鬥爭」共黨的攻擊，祕魯共黨對「卡斯楚主義」共黨份子的排除，智利、阿根廷、玻利維亞、厄瓜多爾、委內瑞拉共黨，亦同樣譴責卡斯楚支援武裝顛覆的陰謀。從此，拉丁美洲各國共黨普遍響起了「親蘇運動」，排斥卡斯楚武裝顛覆的理論。並且最近委內瑞拉、智利、以及厄瓜多爾共黨已提議要在委內瑞拉首都卡拉加斯（Caracas）召開「正統派」共黨大會，以確定他們在走蘇俄修正主義路線上的統一行動。

在卡斯楚方面言，他對外輸出「暴力革命」，主要是依據其個人的「偶然機會主義」經驗。然而古巴赤化以後，拉丁美洲的情勢顯然是大不相同了；

美國對拉丁美洲國家的積極防衛與援助，拉丁美洲國家政府的激烈反應與警惕，尤其是蘇俄對於古巴「革命輸出」的抵制，雖然在卡斯楚與蘇俄不同政策的影響下，拉丁美洲共黨已普遍發生以「武裝鬥爭」而達成「自由解放」，或由蘇俄保護而達成「合法奪取政權」的爭論，但顯然的武裝鬥爭共黨勢力已告衰退；瓜地馬拉山區共黨游擊隊被清剿，巴西共黨武裝叛亂計劃的多次失敗，委內瑞拉共黨游擊隊活動的減少，哥倫比亞共黨武裝叛亂的老巢多已棄守等，這些事實，都可以說明卡斯楚的「偶然機會主義」，當前在拉丁美洲是難以重新出現了。

伍 古、蘇關係的改善與古巴共黨未來發展

從古巴共黨內部鬥爭的發展來看，蘇俄的態度是很重要的影響；一九六二年火箭危機以後，蘇俄不同意卡斯楚的「冒險主義」，反對卡斯楚要將古巴變成一個西半球的「革命中心」，所以就曾指責古巴共黨所有的政策，都是在干預拉丁美洲共黨的內部事務，指使所有共黨必要「武裝革命」。因而在古巴共黨內部就有了裂痕。一九六七年六月，蘇俄總理柯錫金與美國前總統詹森在克拉斯堡羅（Clashoro）會晤以後，於返國途中經過哈瓦那，當時柯錫金與卡斯楚就展開激烈而無情的爭論，柯錫金以停止援助及索償為要挾，而獲得上風。從那時起，卡斯楚就決心要制裁那些親蘇的共黨份子。一九六八年一月，莫斯科冒着與古巴關係破裂的危險，修改與古巴的經濟關係，卡斯楚就立刻對親蘇共黨頭子埃斯卡郎第及其重要黨羽進行了無情的「整肅」。

很顯然的，蘇俄要排除「卡斯楚主義」在拉丁美洲的影響，是因為卡斯楚所推動的「暴力革命」，不但嚴重阻礙了共產主義的進展，並且亦造成頗具危險的混亂。但是蘇俄在整個策略上，為要發動共黨團結，在行動上必須要從事一種間接的阻止，一方積極支持拉丁美洲「正統派」共黨擴大共黨分裂運動，一方限制對古巴的援助，以迫使卡斯楚低頭。所以拉丁美洲共黨武裝鬥爭的嚴重創傷，都來自於蘇俄與古巴共黨間矛盾的結果。

但事實上，蘇俄以古巴地勢恰在加勒比海中央，不僅可威脅美國，亦可

威脅全美洲，故以其戰略上的價值，蘇俄亦決不會放棄古巴，何況蘇俄已在古巴「投資」了大量金錢（註八）。所以當卡斯楚的「蔗糖增產」、「商業國有化」所造成古巴經濟極度混亂，以及卡斯楚所謂的「反革命份子」所造成的政治不安，卡斯楚政權顯然已有不穩的時候，莫斯科亦就必然再給予援助和保護。一九六八年八月，卡斯楚表示支持蘇俄對捷克採取軍事干預立場以後，蘇俄就恢復了對古巴的正常經濟關係。一九六九年七月，蘇俄艦隊訪問古巴，同年十月，古巴共黨就派了一個代表團訪問莫斯科，一方交換兩國共黨組織上的經驗，一方研商加強兩國共同合作事宜。十一月蘇俄國防部長葛瑞契柯（Gechko）訪問古巴，其後蘇俄就給予古巴更多的新式武器，包括飛彈在內。同時，古巴共黨又派遣一個貿易代表團赴莫斯科，從事一項新的貿易談判；蘇俄承購古巴更多的糖，並供應古巴亟於需要的物資與工業裝備，其最後的協定，較之一九六四年的六年貿易協定，更使古巴感到滿意。

在卡斯楚而言，不僅需要蘇俄的援助來解除其所面臨的各種危機，當前拉丁美洲情勢的變遷，亦迫使其對於「革命輸出」的策略，必須要加以改變。幾年來，如玻利維亞、委內瑞拉、哥倫比亞、祕魯及瓜地馬拉所有傾向於卡斯楚主義的武裝叛亂共黨，他們潛伏在山區中的游擊隊，面對着各國政府的武裝隊伍與美國軍事顧問間的密切合作，迄今連他們的叛亂老巢，亦多已被迫棄守。另一方面，當前拉丁美洲民族主義浪潮的澎湃，亦抵銷了「卡斯楚主義」的影響。卡斯楚為不使古巴窒息，拚命要達成一千萬噸糖產的目標，就必須要衡量輕重，暫時終止他的「革命輸出」。這亦就是在一九六九年間，拉丁美洲的共黨顛覆活動，曾一度減少下來的原因。

從拉丁美洲武裝鬥爭共黨反應來看，就更為清楚。本年一月十五日，委內瑞拉共黨武裝叛亂的首領普拉瓦（Douglas Bravo）公開譴責卡斯楚放棄支援拉丁美洲共黨的「革命運動」，而走蘇俄「修正主義」路線的錯誤。（註九）普拉瓦在拉丁美洲武裝鬥爭共黨中是頗具「聲威」的人物，在一九六六年委國共黨分裂，他就與卡斯楚結合一起，共同譴責委國共黨「政治局」是「失敗主義」。一九六七年八月，哈瓦那召開第一屆「拉丁美洲團結組織會議」，他是卡斯楚最受歡迎的人物。但是他們經過四年的「緊密合作」，迄今已真正宣告破裂。而這種反應如在拉丁美洲擴大，無疑的就會表現出

卡斯楚如終止支援共黨武裝顛覆活動，就會失去「卡斯楚主義」的影響，如果卡斯楚真的放棄對拉丁美洲國家所發動的「暴力革命」，其在理論上是必完全破產。基此觀察，相反的，卡斯楚又如何能冒着熄滅拉丁美洲「革命火焰」的危險，而能繼續維持他的暴力統治政權？

但是無論如何，一些拉丁美洲國家政府已對古巴抱了一種希望。尤其是智利外長瓦爾地斯（Gabrit Valdes）及委內瑞拉總統卡爾第拉（Arafael Caldera）均認為古巴已真的放棄了「革命輸出」，而聲言要改善與古巴已終斷八年的正常關係。美國方面亦聲言如果卡斯楚確已放棄對外顛覆，亦不反對與古巴談判。本年二月，智利與古巴簽訂一千二百萬美元貿易協定以後，顯示美洲國家關係將有新的發展。但是卡斯楚最近提出的「游擊戰」必須「城市化」的口號，拉丁美洲各地共黨恐怖份子綁架事件層出不窮，已為拉丁美洲帶來新的災難。這一情勢的發展，無疑將使那些「姑息」的行動成為一種奢望。而卡斯楚之仍留戀於「冒險主義」，則亦必然會在內外交迫情勢

下歸於滅亡。

註一：參閱一九六七年四月二日巴黎世界報。

註二：參閱East & Ouest, 1969, No, 422, P.18.

註三：同註二

註四：參閱一九七〇年三月九日美國新聞周刊，及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九日巴黎世界報。

註五：同註四。

註六：參閱一九六九年十月廿一日巴黎世界報。

註七：參閱East & Ouest, 1968, 2, No, 399, P.16.

註八：同註四。從一九六〇至六九年，蘇俄給予古巴的援助共達四十四億美元，其中經濟援助是卅二億，軍事援助是七億五千萬美元。

註九：參閱一九七〇年一月十七日巴黎世界報。

尼克森非洲宣言的評介

劉偉鵬

在美國國務卿羅吉斯訪問非洲返國後，日前曾為尼克森總統撰寫了一篇長達六千字的美國非洲政策宣言，並已於三月廿八日發表。這個宣言與尼克森在世局咨文中，所提到的美國非洲政策大致相同，其着眼點都是在強調「自由、民主和民族自決」的原則。但是由於美國處理非洲問題的實際態度，與其政策所標榜的理想並不一致；又由於最近處理羅德西亞片面獨立問題的失策，已使美國在非洲的聲望急劇下降。本文擬就尼克森的非洲宣言及美國最近處理非洲問題的實際做法作一探討，並對我國對非外交提出一些建議。

羅吉斯非洲之行的目的，一方面固然是解釋美國的非洲政策，尋求非洲國家的諒解，藉以打破美非外交關係的低潮；另一方面無非是奉命到非洲做一實地考察，與各國領袖交換意見之後，為尼克森撰寫一個特別且切乎實際的報告，以作為今後尼克森政府對非洲外交的張本。羅吉斯的非洲報告，曾獲得尼克森的衷心讚賞，並於三月廿八日公開發表，一般稱為美國的非洲政策宣言。

此報告強調美國與非洲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美國與非洲國家不僅在外交上、貿易上和文化上互相關連，甚至在種族上關係也極為密切。因此美國對非洲各國的關懷，不僅自始就未忽略，且一直是與日俱增。今後美國將尋求